



中国近代思想者丛书

铁笔金针

——林纾文选

许桂亭 / 选注



余老矣無智無勇而又無學不能肆力復我國仇
日莠其愛國之汨告之學生又不已
則肆其日力以譯小說
畏廬曰文章家語往往好言人之所難
眼前語盡人能道者顧人以平易無奇而略之
而能文者則拾取而加以潤色使蔚然成爲異觀
此書不難在叙事難在叙家常之事
不難在叙家常之事難在俗中有雅拙而能韻
令人挹之不盡且前後開鎖起伏照應涓滴不漏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铁笔金针

林纾文选



中国近代思想者丛书

许桂亭 选注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笔金针:林纾文选/许桂亭选注.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中国近代思想者丛书)

ISBN 7-5306-3296-5

I. 铁… II. 许… III. 林纾(1852~1924) — 文集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4537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875 插页 2 字数 176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14.00 元

内 容 提 要

林纾是我国近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第一位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的卓越而又独特的翻译家,是“运输精神粮食的航路”(鲁迅语)的开辟者。他的译作大大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视野,使其得以领略到西方小说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和艺术魅力,将中国读者领进“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钱鍾书语),从而深刻影响并极大地促进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林纾的散文思想深刻,内容宏博,文笔简洁清丽,自然流畅,俏皮幽默,生动含蓄,是中国散文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重要转折和标志。

编辑前言

近代中国的历史,写满了耻辱。伴随着西方列强炮舰而来的,是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国土被瓜分,主权被剥夺,民族尊严丧失殆尽,大量白银和无数珍贵文物流向海外;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民生凋敝,生灵涂炭,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危机。

近代中国的历史,也充满着希望。即使观念最为保守的顽固派,也不再否认这一不争的事实:中国已经落后了。而落后就要挨打,就要被人欺辱。中国人第一次睁开眼睛向外看世界。众多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欲挽狂澜于既倒的有识之士,纷纷将目光投向西方,寻求疗治社会痼疾、摆脱民族危亡、富国强兵、解民倒悬的妙药丹方,掀起了持久的出国留学、越洋考察和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的热潮,出现了一个全方位向西方学习的局面。长期被封建制度和传统观念束缚的思想得到解放,进化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制夷”、“共和”、“立宪”等各种思潮,以及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技救国、再造民魂等各种主张竞相纷呈,划破了神州上空阴霾密布、黑暗沉闷的夜幕,重新点燃了民族振

兴的希望之光。

历史的经验、教训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当前,刚刚摆脱沉重的历史羁绊的中华民族,正以空前迅速的步伐,进一步走向改革开放,创造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新时代。尽管当前的国内政治局面、经济状况和国际环境与鸦片战争后的国内外形势已大不相同,但我们的科学技术、经济实力、文化教育、国防军事以及国民素质、文明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国际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严峻的挑战,也并不比应付当年列强的枪炮来得轻松。落后便要受制于人,更谈不到真正的民族尊严。因此,认真吸取、借鉴前人向西方学习的经验教训,深入开发、充分利用这一丰厚的历史遗产,是完全必要的,人们可以从中获得启迪,少走弯路,使改革开放的步伐走得更快更稳。

为此,我们策划并编辑了这套“中国近代思想者丛书”。本丛书选择中国近代史上曾在各个领域发挥重大作用、产生过重要影响,或在某些方面成就卓著的人士,将最能体现其思想、代表其成就的文章、作品编为一集,人各一书。每书的前言,对其思想、主张、历史作用及对后世的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客观的评价。为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每篇(组)文章均通过题解介绍其背景、主旨、作用和影响。为省却读者翻检之劳,克服语言障碍,还对文中的历史典故、人名地名、有关事件、年代、风俗等语词和引文加以尽量详尽、准确的注释。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获得读者的认可;同时,更希望广大读者和专家对本丛书存在的问题给予直率的批评指正。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1 年 10 月

前 言

林纾(1852—1924)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林纾可以说是从旧文学过渡到新文学的一座桥梁,他之所以能起到桥梁的作用,主要不是由于他的文学创作,而是由于他的小说翻译。

我国的翻译史上,林纾是第一位以文言文译述欧美近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家(他不懂任何外文,是依靠多位通外文者的口述而进行笔述的。他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兼职时,职名为“笔述”,他的合作者的职名为“口述”),在“运输精神粮食的航路”(鲁迅语)上,林纾无疑是一位开拓者。他翻译的一百多种“林译小说”,在20世纪初期风行一时,大大开阔了我国知识子的眼界,使他们首次认识了西方小说的艺术形式,将他们领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钱鍾书语)。林纾对世界文学名著的译介,深刻影响了我国20世纪初期的一代作家,促进了我国现代文学的兴起和发展。

林纾所处的时代——清末民初，正是我国历史文化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蒙受了丧权辱国的耻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一步紧似一步的侵略，更加之中国封建制度本身的崩溃与解体，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为了民族的生存，从19世纪70年代起，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涌现出改良主义思潮，这些受到过西方文明制度和早期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影响的分子，要求清朝政府不只是开办洋务，造轮船、枪炮，而且应该以西方为榜样，进行某些政治制度的改良，以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到了19世纪的90年代，由于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瓜分，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灭亡的恐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因此，在1895—1898年间，中国资产阶级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与经济上的软弱，这场维新变法运动很快流产失败，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被囚禁，谭嗣同等人被杀。1900年，爆发了以反对帝国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义和团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中国农民表现了无畏的反抗精神。清朝政府出卖了义和团，和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巨额赔款，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更加贫穷，使整个国家的经济更加凋敝。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革命后出现了动乱的社会局面。1917年新文化运动兴起，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革命的历程发生了重大转折。

林纾亲身经历了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对他的思想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都在他的著作中留下了或明或暗、或深或浅的印迹,得到了正确的、错误的或正误参半的反映。

二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冷红生、践卓翁等。清咸丰二年九月(1852年11月)出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市)。林纾祖籍金陵,祖上世代务农。林纾之父林国铨自幼习商,后到台湾谋生,家中靠母亲和姐姐为人做针线度日,生活清贫。林纾曾一度在外祖母家寄食。

林纾少年时,祖母曾教诲他说:“吾家累世农,汝能变业向仕宦,良佳。但城中某公,官卿贰矣,乃为人毁舆,捣其门宇,不务正而踞高位,耻也。汝能谨愿,如若祖父,畏天而循分,足矣。”故自号“畏庐”。

林纾19岁时,祖父、父亲、祖母相继去世。少年林纾,家境虽清贫凄凉,但却酷爱读书,每晚借母亲、姐姐刺绣的灯光苦读至深夜。青年林纾,渐有文名,被人称为福州“三狂生”之一。31岁时中举。

1884年8月,法国军舰在福州突然袭击中国海军,击沉中国舰只十餘艘,死伤数百名官兵。林纾闻讯,在大街上痛哭失声。十月,钦差大臣左宗棠到福州督办军务,林纾与友人在马前拦道,上状控告前任大臣谎报军情。林纾曾作诗百餘首抒愤。

1894—1895年中日战争期间,中国屡遭失败,林纾的一位近戚在海上战死,这都使他心中如焚,悲愤异常,并促使他接受了改良主义思想。1895年春,康有为在京参加会试,组织了有

名的“公车上书”，从此，维新变法运动在全国形成一股政治潮流。在此期间，林纾密切关注着运动的发展，常与朋友一起议论新政，讨论自强之策。同年春，林纾在京联络友人，上书清朝政府，抗争日本侵占我辽东、台、澎等地。

“废科举，兴学校”，是维新变法运动的一个主要口号和行动纲领。林纾在家乡积极响应这一号召。1897年，他写信给本县两位富豪，恳请他们出资兴办中学堂，遭拒绝后，他便与友人合作，将自己的旧居改建为“苍霞精舍”。这是一所比较新式的中学堂，林纾自任汉文总教习，讲授《毛诗》、《史记》，聘人讲“西学”。他力劝青年学生学好西文，以便掌握建设国家的有用知识。

同年11月，林纾创作的三十二首《闽中新乐府》在福州用活字版印行。这些诗中充满了愤念国仇、忧愤时俗和积极倡导维新变法的思想。文字浅显易懂，是别具一格的白话诗，这些“新乐府诗”，其中有些十分近似于谣曲。它的创作，表明了林纾一种新的文学观念的诞生，以及他对诗歌的见解，“诗之道，以自然为工，以感人为能”，因而这些新乐府诗在他的故乡广为传诵。

1897年，由王寿昌口述，林纾笔录，二人合作翻译了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从此，林纾就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开始了自己的翻译生涯，这不仅对林纾一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系统翻译外国文学名著的开端。

1898年即戊戌年春天，林纾再次来京，在京期间，同著名的倡导维新变法的林旭相交往，并同舟南下游江南。在京期间，林纾与友人再一次上书清政府，抗议德国人侵逼山东，并陈筹饷、练兵、外交、内治四策，希望政治得到改良。但由于当局昏败，言

路阻塞,原书三上均被退回。这事对林纾刺激很大,使他深感中国进行政治改良的必要性及迫切性。

1901年,林纾迁居到北京,任金台书院讲席,又受聘于五城学堂,为总教习,讲授国文、修身等课程,后又任职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为“笔述”。年中,清廷诏开经济特科,礼部侍郎郭某推荐林纾,林纾坚辞。在《上郭春榆侍郎不赴书》中说:“今纾行不加修,而业益荒落,奈何贪美名、觊殊赏,冒进以负朝廷,而并以负公也?”1906年,林纾受聘为京师大学堂预科和师范馆的经学教员。1910年,执教大学经文科。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林纾作为清朝的举人,自誓“不再谋仕民国”(其实,他中举后,在清朝也没有做官),甚至一度中辍在北京大学的教学工作。自1913年起,直到他的身体实在不支的1922年为止,十年当中,他十一次长途跋涉,到河北易县清西陵拜谒光绪的陵墓,口称孤臣,跪浇陵树。同时向逊帝溥仪称臣进画,溥仪数次赐他手书春联,并手书“贞不绝俗”匾额送他,还颁赐袍料、褂料。林纾受宠若惊,自称“呜呼,布衣之荣,至此云极,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死,必表于道曰:清处士林纾墓。示臣之死生,固与吾清相始终也。”(《御书记》)林纾政治态度的顽固与迂腐,由此可见一斑。

1912年11月1日,《平报》在京创刊,林纾在该报“铁笛亭琐记”、“讽谏新乐府”、“文苑”、“译论”、“社说”等专栏发表著述,并于“践卓翁短篇小说”一栏发表短篇小说。12月1日,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庸报》,林纾应邀为撰述人。1913年冬,《践卓翁短篇小说》由都门印书馆铅印,林纾自序:“余六十以外,万事视为传舍,幸自少至老,不曾为官,自谓无益于民国,而亦未尝有害。屏居穷巷,日以卖文为生,然不想论时政,故着意为小说。”

(此书后易名《畏庐漫录》，于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14年夏，林纾与友人同游山东，登泰山，谒孔林、孔庙，写有游记一组。同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华大字典》，林纾作序。1916年，《铁笛亭琐记》(共236则)由都门印书馆印行；1922年，易名《畏庐琐记》，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1915年以后，一个以《新青年》杂志为喉舌、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形成；1917年初，便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并逐渐形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林纾对于这场新的运动，由抵触到反对，最后终于跳了出来，对它大肆攻击，他在任教的几所学校里，声嘶力竭地咒骂它；在《论古文之不当废》一文中，为旧文学和僵死的文言文辩护；他在翻译小说《孝友镜》的“译后小识”中，攻击提倡新道德的人们是“逆子叛弟”；在别的文章中，甚至对于年轻女子剪发、不裙而裤都滥施攻击。他的这些攻击，遭到了《新青年》同仁的反击，并被戴上了“反对文学革命顽固派”的帽子。

1919年春，在伟大的“五四”运动到来前夕的2月17日、18日，林纾于上海《新申报》特辟的“蠹叟丛谈”专栏中发表《荆生》；3月18日至22日，又发表《妖梦》。这两篇冒充小说的怪文，恶毒谩骂诅咒《新青年》同仁。4月5日，林纾又在北京《公言报》上发表了《腐解》一文，咒骂新文化运动，表示要拼命“卫道”。与此同时，他写公开信给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信中诽谤白话文为“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他说，如果写白话文的可以在北大当教授，“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在信中，他继续攻击提倡新道德为“人头畜鸣”，俨然以道德家自居。可就在这封信中，他对受人尊敬的蔡先生施行人身

攻击——“引车卖浆之徒”(拉车卖豆浆的无知之辈),实指蔡先生之父(见鲁迅对日译本《阿Q正传》的校释)。其后,又撰写《论古文白话文之相消长》一文,坚持固有观点;同时,他在背后运动他的同乡福建省议员弹劾蔡元培,压迫《新青年》同仁。林纾的恶劣表现,引起了鲁迅先生的极大愤慨。

林纾的顽固态度一直坚持到他死时。1924年5月(死前四个月),林纾最后一次力疾往孔教大学讲课,在临别诗中还叫嚷:“学非孔孟均邪说,话近韩欧始国文。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

林纾晚年在一首诗中说:“老来卖画长安寺,笑骂由他我自聋。”这一方面可以看出他的顽固和矜持;另一方面也说明面对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他是无可奈何的,只能感到孤寂与悲凉。1924年10月9日,他就在这种心境中死于北京。他的反对新文化运动顽固派的名声,从此也就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了。

林纾晚年思想的蜕变,绝不是“基因于生理退化的缘故”,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目的狭隘、有限及革命的不彻底性在它的知识分子身上的一种反映。随着革命运动的日益深入与发展,当革命的目标远远超出了维新派及林纾的要求时,维新变法运动的代表人物(如康有为等人),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从先进分子蜕变为保皇党,林纾也随之由先进分子变为顽固派,变为新的革命运动的反对派,受到人们的唾骂。不过,林纾晚年的迂腐与顽固,也还有着属于他个人的原因。辛亥革命后,林纾对清王朝的忠贞,其中相当大的成分是对支持维新变法运动的光绪皇帝的怀念及哀挽。幼年时,林纾是在极端清苦的情况下博览群书,自学成才,具有了极高的古文学的造诣,他凭仗着深厚的古文学修养跻身于清末文坛,受到人们的重视与赞扬。古文是

他的安身立命之本,林纾把古文视为自己的生命,对它有着深深的眷恋。在学习研究古文学的过程中,旧的道德、旧的观念自然对他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当革命者提出要废弃古文、提倡白话文时,林纾站出来竭力反对,是不足为怪,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还出于士大夫阶级的偏见,认为古文高雅,是学问;白话文粗俗低级,无学问可言。正是出于上述种种外在、内在的原因,林纾在20世纪初期的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时期,站在了复古主义的逆流之中,被人称为“最激烈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代表人物之一”和“抱残守阙者流”。

历史上的现象往往是十分错综复杂的,特别是在社会发生巨大动荡、历史处于转折时期。鲁迅先生曾指出,“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鲁迅全集》第6卷第27页)。林纾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小说,对于从1917年以来开始的“文学革命”的到来,无疑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但当这场文学革命真正到来时,他却站在了反对派的立场上咒骂它。他在起劲咒骂新文化运动的同时,实际上也等于否定了他先前的自己,因为他先前的所作所为,都是为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做着准备的。

三

在清末民初的文坛上,林纾是位著名的古文家。从幼年起他就开始学习古文,在13岁至20岁期间,他校阅古书不下两千馀卷,30岁以后又读古书三四万卷,迁居北京之后,又在各大学堂教授古文。关于古文,林纾有作品也有理论,修养造诣极高。他用古文写诗填词著文,也用它翻译西方小说。他尤其推崇

《史记》、《汉书》以及韩愈、柳宗元的文章，对它们进行过长达数十年的研究，深得其精髓，1914年他著的《韩柳文研究法》，就是他多年来阅读研究韩、柳文章的心得与体会。在当时，一般人谈论古文，均以林纾为师法，他自己也以古文自诩，“六百年中，震川以外，无一人敢当我者”（《震川集选·序》）。

1919年，在刘半农的《复王敬轩书》中，林纾被讥讽为“桐城谬种”。那么林纾究竟是不是属于“桐城派”呢？1921年（辛酉）初夏，林纾与友人南游雁荡山，北返途中，林纾在上海拜访了康有为，其后在《震川集选·序》中，林纾记载了他们此次会见的情形：“辛酉五月，余晤康长素（康有为号长素）于沪上。长素曰：‘足下奈何学桐城？’余笑曰：‘纾生平读书寥寥，左、庄、马、班、韩、柳、欧、曾外，不敢问津；于震川（明古文家归有光）则数周（遍读）其集，方、姚（指清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和桐城派主要作家姚鼐）二氏，略为寓目而已。’长素恍然。”很可能正是针对着康有为提出的责难，林纾在这篇序的开始处说：“夫文字安得有派？学古者得其精髓，取途坦正，后生遵其轨辙而趋，不知者遂目为派。然则程、朱学孔子，亦将谓之为曲阜派耶？”这里所表述的正是林纾论文的一贯主张。在本书所选文章中，他不止一处表示了相同的观点。

那么，林纾为什么被人们误认为是“桐城派”呢？对于这个问题，著名学者钱基博先生早有公允的说明。钱先生在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指出：“按林纾论文不薄六朝，论诗不主西江，不持宗派之见，初意未尝不是！顾晚年昵于马其昶、姚永概，遂为桐城护法，……宗派不言而自立，党徒不收而自合，召闹取怒，卒丛世诟，则甚矣盛名之为累也。或者以桐城家目纾，斯亦皮相之谈矣。”

此外，钱基博还公正地指出：“纾之文工为叙事抒情，杂以恢诡，婉媚动人，实前古所未有，固不仅以译述为能事也。……晚年名高，好为矜张，或伤于蹇涩；不复如《初集》（指《畏庐文集》）之清劲婉媚矣。《初集》出，一时购者六千人，盖并世作罕觐焉！”

从上述情况看来，林纾并不属于桐城派。他所推崇的是左、马、班、韩的文章，认为“此四者，天下文章之祖庭也”。他自己的散文创作，就汲取了他们的精气神味，而又有自己的变化与创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既能“入”，又能“出”：“入者，师法也；出者，变化也”（《春觉斋论文》）。

林纾的文集，除我们前边已经提到的《畏庐漫录》和《畏庐琐记》之外，最重要的是：《畏庐文集》（19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畏庐续集》（19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畏庐三集》（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三部文集，都是林纾生前手订的，本书所录的文章多数选自这三部书。

林纾的散文（即古文），从内容与题材看，可分为人物传记、山水游记、叙事抒情、杂文、诗文集序跋，此外，还有祭文、墓志铭、寿序等。

林纾所写的人物传记，篇幅极短，而且都十分有特色。它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记，写其人物的一生或大半生或一个时期。他的人物传记只写人物生活的一个片断，类似于人物素描。通过这个片断，林纾就能写出人物的身世、性格、思想、命运，以及他同周围世界的关系，颇有小说的色彩。另外，作家通常都是给名人作传，可林纾写的人物传记大都是普通人，甚至是社会底层的人，如《书葫芦丐》和《赵聋子小传》。这显示了他的民主精神，同时也显示了“专为下等社会写照”的英国作家狄更斯对他

的影响。

《冷红生传》是林纾的自传，在短短的数百字里，就写出了自己的身世、性格特点：多情又却情，是个“木强之人”，以文章名于时，生好著书；又写出了笔名“冷红生”的来由。文字中还杂合着些许的诙谐与幽默。《徐景颜传》写了三位海军将领在中日甲午海战中英勇战死的悲壮情景。《薛则柯先生传》用白描的手法写出了先生生活的清贫、性情的高洁、对学问的执著以及对学生们的爱，字里行间流露着林纾对先生的深情与敬仰。《赵葦子小传》和《书葫芦丐》写得绘声绘色，极富风趣。这两篇传记重点似乎不在为人物作传，而是以特殊方式传递出作者诋官讽世的情怀。在《书葫芦丐》中，人们问乞丐：已经潦倒到此地步，为什么还口口声声感谢皇帝的恩典？乞丐回答：“吾无功，日令百户之人供我醉饱，有司不以为罪，此皇帝宽典也。夫今之作邑者，取醉饱于一邑；作郡者，取醉饱于一郡，其无功与我埒耳。”这两篇诋官讽世之作写得十分乖巧，既谐谑而又令人沉思。

游记散文是林纾散文中最富艺术价值的部分。林纾是个多情又多艺的文人，能诗善画，尤其是山水，因此林纾既善于抒情，又善于“状物态”，他的游记散文中充满了诗情画意。他笔下的溪水、梅花、竹径、怪石、山泉清潭、西湖的月夜，……都各具特色，又都蕴含着作者自己的情怀。其中重要的有《记超山梅花》、《游西溪记》、《湖心泛月记》等。他的这些山水游记既有着山野的情趣，又都有着极浓重的文化历史色彩。林纾多是同他的文坛好友一起游历，一起欣赏这些名山胜水，所以林纾对于超山梅花、西溪、栖霞、云栖等胜景的描绘，反映的都是有高度文化教养的有丰富的文化历史知识的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是他